

◎ 焦树安 \ 著

焦樹安文集

任繼愈題簽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焦树安 \ 著

B-53
J57

焦树安文集

任继愈题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树安文集/焦树安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2. 8
ISBN 7-5013-1943-X

I. 焦… II. 焦… III. ①焦树安-文集②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2086 号

书名 焦树安文集
著者 焦树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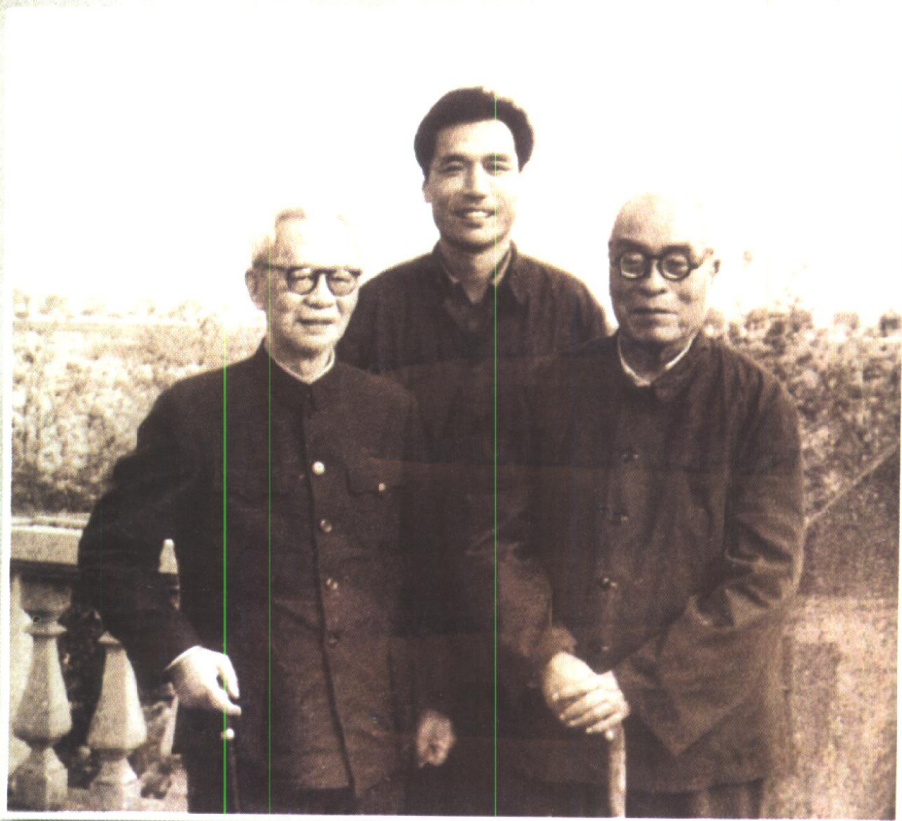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电话(010)66126153 传真(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3.5
版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35(千字)
印数 1—1000

书号 ISBN 7-5013-1943-X/B·104
定价 25.00 元



焦树安在第五届国际哲学会议上宣讲中国哲学
(1994年于莫斯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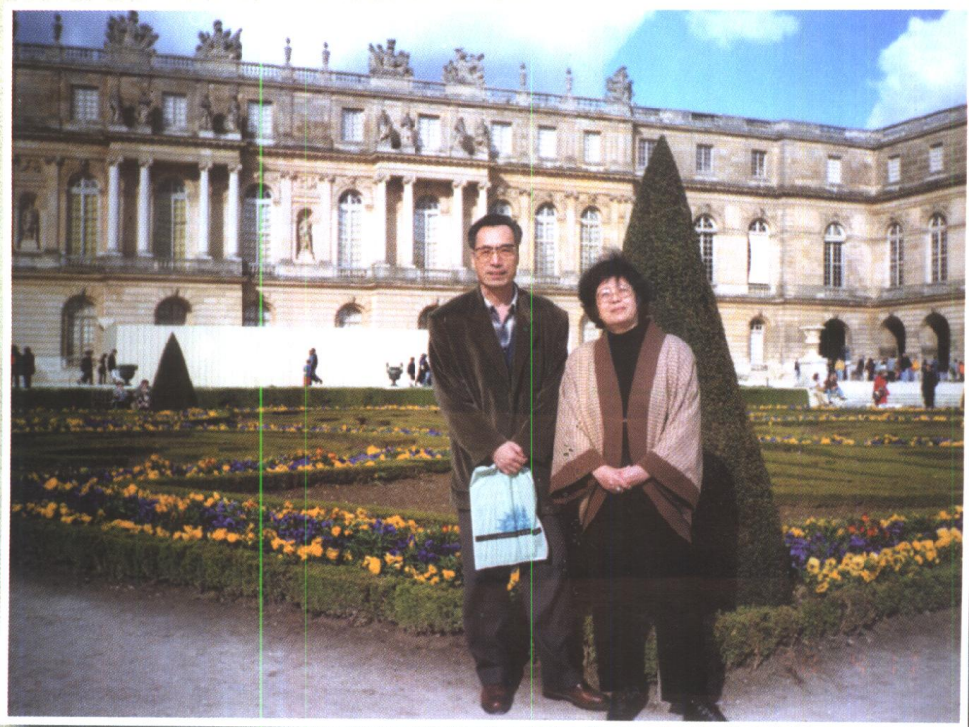
焦树安与导师—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贺麟

(1981年于杭州宋明理学会闭幕式)



焦树安与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

(1995年10月于陕西终南山楼观台)



焦树安与夫人——北京大学教授邵秦相伴赴法国讲学
(1998年于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前)

序

焦树安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由国家分配到北京图书馆工作，至今近四十年。他曾任参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他一贯敬业、勤奋、求实、严谨，是位优秀的研究员和部主任。

焦树安在哲学、史学、中西文化研究领域，有较深造诣。利用参考研究部的工作之余，凭藉深厚的学术修养，撰写哲学著述，写过不少篇具有新见的文章。他写文章是经过认真思考，可写可不写的文章，他不写；他写文章看准、想透才下笔，读起来不肤泛，有深度，使人耳目一新。

焦树安同志除了担任图书馆的工作外，还担任过《中国哲学史》编委会的工作，还协助我主编《中国文化史知识小丛书》（100种）和《中华大典·哲学典》，任常务副主编。他这部文集并不限于有关图书馆的文章，多数是他业余写作的。

焦树安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有较深造诣。写中国哲学方面文章，有西方哲学基础作支撑；写西方哲学又见到他中国哲学的功底。他的文章文风朴素、平实、自然、顺畅，有理有据，逻辑推理判断力强，能将现代意识与传统文化底蕴结合起来研究。

焦树安在中西方哲学学会担任重要职务，曾兼《中国哲学史》杂志副主编，参与中外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他的独到见解，颇受好评。

焦树安与我合作，我们共同组织编写一套《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找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写作，主要为广大青少年撰写通俗读物。他广泛联络作者，审阅书稿，及时提出中肯意见，使我们这套包括百种专题的丛书得以如期问世，1991年第1版发

行受到社会广泛欢迎，并越过海峡，刊出繁体字增订版本，相继有许多著作译成外文，在海外发行。

焦树安于1997年退休之后，旋即赴国外讲学，他退而不休，我邀他回国参与国家项目《中华大典·哲学典》大型工具书编撰工作，他帮助我筹划哲学典的启动工程，这套三千万字的大型类书正在顺利启动，显示了他的领导组织才干。

焦树安为人正直，遇到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敢于仗义执言，对个人却是淡泊名利。他的为人与为学深得同仁与学生们的钦重。

焦树安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培养的哲学学人，具有扎实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系统的哲学思维训练，负担图书馆管理工作游刃有余。

有人误认为哲学道理太玄虚，太抽象，在实际工作中用不上，而从焦树安多项工作中，看出他善于把握关键，以简驭繁的能力，懂哲学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

任继愈

2002年4月3日

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目 录

序	任继愈 (1)
比较哲学	(1)
略论存在主义	(148)
谈马勒伯朗士论中国哲学	(160)
比较哲学的历史、现状和方法论问题	(167)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189)
波普“三个世界”的理论简析	(199)
二进位制数学创始者辨正	(217)
试论当前比较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222)
试述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中有关语言学的 几个问题	(238)
试论大盐平八郎的哲学思想	(260)
中国当代哲学发展概述 (1949—1994)	(277)
莱布尼茨对于中国哲学的理解	(352)
老子思想的当代意义	(363)
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二卷本)	(370)
冯友兰的“贞元六书”	(383)
回忆冯友兰先生	(394)
力行反帝爱国、兼容并包、美育新人的蔡元培	(402)
焦树安主要著述索引	(417)
跋	(422)

比较哲学

前言

人类脱离动物界至今，据最新考察，至少已有 500 万年的历史了，原始人最初以采集、狩猎和刀耕火种为主要的生产手段。依照血缘关系的不同，原始人形成家族和部落，产生了共同的语言、风俗，形成了最初的民族。随着生产的发展，各个民族有了交往，这种交往最初是经济上的，尔后发展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任何两种不同思想文化的接触与交流，都要引起人们比较二者的同异与优劣，师长去短，发展自己的文化。在历史上，中国和印度的这一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至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佛教传入中国之始。欧洲和印度的交往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毕达哥拉斯提出灵魂转世说及公元前 338 年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击溃波斯帝国入侵印度就开始了。随着生产的发展，中国和欧洲的接触始于先秦两汉中国文化西传也为实证所说明（请见翟尔斯（H. A. Giles）的《中国与中国人》（*China and Chinese*）第四章，明确提出中国与古希腊文化风尚有二十余项或全相同或有关系的实证）。哲学文化的相互交流是比较哲学产生的基本前提，单是时有时无的暂短接触与交流，而无彼此缜密的相互研究，是不能产生比较哲学的。从十八世纪欧洲进行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之后，经过 200 多年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交通的便捷，人类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打破。尤其在当前，人类大规模的文化沟通和交流，彼此都感到相互交往、相互

了解、相互补充、相互吸收是十分必要的。这种了解和需求不是出于一种理智的好奇，而是人类面临的生存现实问题，在保持自己文化固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的优秀文明，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中，强调“改革开放”，建设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离不开中外比较研究。

在比较哲学里，人们是从宏观的角度，以一种整体性来观察哲学文化传统，来分析每一哲学文化传统的特点，它的思潮与主题，了解多种哲学文化传统的共性，缩减各自的陌生感，澄清各个哲学文化传统的殊性，对这种殊性的产生给予理性的说明，在这个基础上促进人类的理解，推动人类文化传统的汇合。

第一章 比较哲学的定义

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是近年来在欧美和日本等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倾向。这种研究越来越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与关注，并形成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比较哲学这个名称是由法国哲学家保尔·马松—奥塞尔（Paul Masson—Oursel）在1922年撰写的一篇题目为《比较哲学》（*La Philosophie Comparée*）的论文，由于该论文在1923年正式出版，而流传起来。

现今的世界有上百个国家，上千种民族，就哲学文化而言，有各式各样的流派，众多的主张和观点。对这些纷纭复杂的哲学派别，根据发展的源流和传统加以系统归类，这种按照不同的文化传统进行的划分，是研究比较哲学的首要前提。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亚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 1875—1965）在《文明的衰落与复兴》（*The Decay and Restoration of Civilization*）一书中明确提出划分文化传统所需具备的三个条件，“即一个完整的宇宙理论，一种伦理活动的心理态度和对生命的尊敬”。（见该书

1950 年英文版第 7、8、9 页) 据此, 他对世界哲学的文化传统加以分析, 他认为世界上的文化传统, 考辨源流, 可归结为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三种类型。他还进而认为西方哲学是对现实与生命的肯定, 然而这种肯定是自证的, 但在它的思想中没有办法建立令人信服的永久的现实和生命肯定的世界观。中国哲学是已有了清晰的观念的, 是对于生命和世界的肯定。印度哲学是对生命和世界的否定。(以上请参见《文明与伦理》英文版, 第 117 页)。从文化传播的地域的角度, 日本学者把这三种类型的人类传统文化划成三个文化圈。第一是欧洲文化系统, 或称之为希腊的、犹太的文化圈。它包括了犹太教、基督教文化为中心及其影响下的欧洲、西亚、北非和美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民族和国家。第二是中国文化系统, 或称之为儒教文化圈。它包括儒家为中心的由中国思想影响和制约的中国、朝鲜、日本、越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的民族和国家。第三个是印度文化系统, 或称之为印度教、佛教文化圈。它包括印度思想影响和制约下的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不丹等南亚的一些民族和国家。

这三个传统的共同本质就是人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提出各种不同的问题, 从而形成各自的传统。西方哲学传统的特点是外在性 (Outwardness), 其哲学的主要表现为理性主义 (Intellectualism) 与人本主义 (Humanism)。自从理性发现了自我, 并且随着对物质的质与量的认识的扩延与深化, 因而形成西方哲学的主流是趋向科学的、外在的、客观的。从古希腊伊奥尼亚学派直到现今的分析哲学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用物理学发展的过程来观察这一传统形态是异常明显的。这种传统着重于客体的讨论, 而主体性的研究没有占据主位。西方哲学从普罗泰哥拉、苏格拉底直到今日的存在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人本主义, 而它的人本主义始终在哲学中不占中心地位, 且受到了科学与理性的支配和制约, 这一点与中国哲学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有极大的不同。西

方哲学的这两个传统表现的线索始终贯穿在从古希腊到当代哲学全部思想脉络之中。

中国哲学传统是人文性，它的主流是实用的人本主义（Pragmatic Humanism）。就哲学而言，中国哲学面向的基层面就是人与社会，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因为中国哲学是以阐述国家与社会的理想形式为目的，讨论社会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最后的根据，因而人事的关系是中国哲学首要关注的问题。人是它的哲学研究的中心，包括与人有关的人的本体问题，为人之理，成人之道，修齐治平之类。因此任何抽象的形而上学的讨论也是为了解释人事，讨论怪、力、乱、神，也是为了国家与社会的阐释，因此中国哲学是一种具有典型的人文性的哲学。

印度哲学的传统的主要贡献是内向性（Inwardness），主要在于它对精神自由的阐发。印度哲学不像西方传统的物理主义以其理性专注于外在性的物质上，而它应用所有的智慧来阐述内在的精神。印度哲学追究自我（Atman）的终极性质是它的重要特征。在讨论外在性问题时，人事被排斥在十分不重要的地位上，那么这个由人事构成过程的历史，激不起哲学家的丝毫哲学兴趣，它认为人的理性是低层次的，最高的层次是自我，当自我与梵超越理性时，也只能以超越理性的直观去认识他们。

这里必需指出，这种对于人类基本传统文化形态的划分，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这种划分是指把人类文化类型按其源流、系统给予的最概括的归类。因此，在同一文化型态中的不同的地区、民族和国家还会有各自的不同，尽管有千差万别，但其基本传统是属于同一文化类型的。如中国和日本，朝鲜与越南有着千差万别，但从总体上他们是从属于中国文化传统，是儒家文化影响和制约下的民族和国家。

第二，伟大的文明与文化都在它自己的哲学中，有过对自己

通盘的反思，自认为自己的哲学对认识目的、方法和追求价值具有至上性。所以，没有一种文化只是一种哲学，有了这个认识，就能如实地反映各个文化传统，而避免简单化。事实上情况远比理论复杂，因为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都包含有众多的学派和系统，这在西方哲学中尤为突出。

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早期伊奥尼亚哲学纯粹宇宙观与智者“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主义构成了希腊哲学的两个潮流。尔后二者融合在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哲学里。希腊哲学充满了理性和科学的思想以及国家与社会的意识两个方面。中世纪时期，基督教思想把来自希腊传统和始于种族且是超自然的犹太传统二者调合起来。本来理性主义与超自然的宗教是矛盾对立的，哲学要探讨人和自然的本质，而宗教以上帝为造物主，抬举信仰，贬抑理性，使哲学成为宗教的仆人。这就是中世纪两种思潮斗争的实质。直到近代哲学中，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继续发展，理性战胜了信仰，人本主义战胜了宗教神本主义。到了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个潮流依然主宰了它的哲学的基本方面。从这一发展线索中看到：从古希腊开始的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贯穿到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当中，尽管它们以泛神论、自然神论、经验论、观念论、一元论、多元论、机械论、进化论、自然理性论、直观论、逻辑论等多种形式出现，但毕竟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表达了西方哲学的这一基本传统。

至于中国哲学始终面对现实的人与社会和国家，中国哲学的这种意向性使哲学的兴趣在于富国强兵，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与君主圣贤上面。世界上很难有另一种哲学与社会组织、国家生活结合得如此紧密。中国哲学把探究人性作为哲学的共同基础。因此，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它是一个道德的政治哲学。以道德和政治为中心。从先秦开始，诸子百家，议论的中心是阐述社会和国家理想形式以及这些关系的最后根据。正如《汉书》所断

言“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卷三十）儒家主张定礼仪，道家主张尊性适道，阴阳家主张观天象与四时，墨家主张兼爱非攻，名家主张讲究名实，法家主张严格法制，农家主张君民并耕，纵横家强调合纵连横，杂家摘取各家之说，主张完善政府和国家等。所有这些流派无论有什么不同主张，但他们的中心是人，不仅是人本性的问题，而且是整体的人，包括本性与现象。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人之所以为人之理，成人之道。即使讨论宇宙论最终也归结于此。中国哲学的这一特点，在尔后的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中始终成为它的中心。尽管如道教与佛教中有神、仙、怪、力、乱等说教，这个目的仍在于社会与政治，中国哲学并不在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迷惑了自身，他们所要关心的不是人为老天爷，而是要老天爷为人。

印度哲学的特点是向内追索，因为它的主张为“梵我一如”，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与世界本原“梵”同质的“我”，只要能内证“我”的存在，就能内证“梵我一如”。为了内证“我”的存在，印度哲学便对人的感觉、思维等一系列的精神活动做了许多细微的分析，划分出许多层次。这种内心的追索与禅定成为印度哲学的特点。这种特点，分别体现在吠陀传统分流出的婆罗门正统派的闍弥尼派和吠檀多的婆陀逻延派以及各有独立的方法之正论—胜论和数论—瑜伽中，也体现在耆那派和佛教彼此独立且有纯正的信仰的非正统派中。总之，在每一传统中，各学派在历史的进程中彼此交融，但不管学派的分歧，都表现出一贯而持续的传统。

第三，这种关于传统文化的基本划分是哲学传统的划分，不是比较宗教学的划分，因此没有犹太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出

现。这是因为就犹太文化而言，它已成了西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西方传统合流了。然而在某些哲学专题的比较处理上，尤其在伦理学中，对犹太的思想就要特别注意。对于伊斯兰哲学所以没有列出一个系统的主要根据，其一就是就伊斯兰哲学而言，它不是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的混合，就是二者与新柏拉图主义的结合；其二是伊斯兰哲学经北非进入欧洲后，实际上已成为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先驱，而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一个更早的文艺复兴。这说明伊斯兰哲学与古希腊及希伯来思想极为类似，事实上它也早与欧洲哲学融为一体。

第四，关于文化类型的划分，是将人类自古至今内容不同、形式各异的基本文化形态作出的概括，这一划分是高层次的概括：首先，因为这种划分可以使我们把庞杂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形态得以按源流归类，可以追溯自己的发展源流前后继承关系与发展脉络；其次，打破了地区、民族、国别哲学史的低层次的概括，用三个基本文化传统的系列划分，可以得出高层次的共同性与差异性，避免了无规定性杂乱类比，便于找出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再次，只有这种基本文化形态的划分，才是比较哲学的科学基础，才能使比较哲学成为可能。

在比较哲学中，日本、美国等国学者所普遍采用的基本比较方式共有四种：

(1) 纵比方式：也即美日学者称之为“枢轴时代”(Axial Age)的哲学比较。这是指比较不同文化系统哲学的源流与发展历程，即“史”的比较。

(2) 横比方式：这是指对同一时期不同文化系统内的哲学思想加以比较。打破民族、国别哲学的地域主义(Provincialism)。对各个文化系统在不同地域上平行发展加以剖析，用以研究人类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

(3) 同比方式：是将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取其共性加以研